

从东亚金融危机引起的对亚洲模式的思考

——以韩国经济模式为案例的分析

谷书堂 禹在基

近些年来,由于东亚经济增长快速,龙腾虎跃,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于是“东亚经济模式的成功”,“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等等,一时广为传颂。正是当人们陶醉于这些美好言辞的时刻,一场席卷亚洲波及全球的金融风暴突然袭来,使人们一时头晕目眩,莫知所从。西方经济学界和舆论界的评论从过去几年对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高度赞扬骤变为强烈指责东亚各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政府干预过度等等言辞。这不禁令人想起美国克鲁格曼 1996 年的一篇警言。

进入 90 年代以后,从 1990 年开始的日本的连续多年的经济衰退,1997 年 7 月开始于泰国继而蔓延至东亚地区(中国大陆除外)的金融危机,让越来越多的人对东亚的发展模式产生了疑虑,甚至有人把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这种发展模式。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东亚发展模式的问题。第二,如果东亚发展模式存在的话,如何认识它与这次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对它评价的问题。

一、是否存在一个亚洲发展模式

对此的答案也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各国和各个地区的经济体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它们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东亚经济模式,而共同点只是在近 20-30 年间这些国家都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乍看起来,情况却如上述,但若仔细分析,则可看出东亚和东南亚多数国家和地区在许多主要方面表现出的特点却是相似的或是相近的,其中包括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建立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如果东亚经济模式存在的话,那么究竟指的是什么,范围或境界又是如何,在认识上是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其实东亚经济模式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这个概念是为了描述 60 年代以后实现经济发展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四小龙”(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而由有些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一般不包括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在四小龙中,严格地说,韩国是受到这次金融危机的所谓东亚发展模式的唯一的国家。但当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仅在韩国,而且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以后,世界各国舆论媒体和经济学术界都尖锐批评

东亚经济模式,把它视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而且他们对东亚发展模式下了相当不同的定义。比如,有的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出发,认为东亚模式是政府主导市场的发展模式;有的从对外贸易和工业化角度,认为东亚模式是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有的从经济增长的要素着手,认为东亚主要都是靠粗放型的要素投入来推动增长的;甚至还有有的从文化传统的共同点切入,认为推动东亚经济发展的共同因素在于它们都有儒教文化传统。但一般作为东亚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提出的以政府主导为主的发展却难以包括香港,而儒家文化传统的说法也脱离了亚洲各国的情况,因为除了儒教之外,东亚还有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各种各样的宗教文化。因此,不应轻易地把上述的几种定义套在引导亚洲经济发展的东亚国家头上。东亚发展模式是整体和演进的概念。

最初,刚从欧美和日本的殖民体系中解脱出来的一些亚洲国家,都是在侧重于殖民地倾向的经济结构的初期条件下追求实现工业化。战后初期,不管是战败的日本还是获得民族独立的亚洲其他国家,都面对着经济恢复和经济发展的任务,即面对迅速摆脱经济落后困境和追赶先进国家的严峻挑战。但是,国内还没有形成有机的产业结构,并且这些亚洲国家地域狭小、资源禀赋贫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方发达工业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市场欠发育或残缺的严重问题。在这种初始经济条件下,亚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程度相对来说也处于较低的状态。所以,需要一个“集体行为”来凝聚当时半殖民地状态的经济力量。东亚各国政府正是在此背景下发挥了特殊作用,即运用强制的办法来推进市场环境的发育和完善,以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东亚国家在经济、技术、资本、制度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而且战后,通过技术革命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的西方国家,凭借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挤压着亚洲国家。东亚国家则具有劳动要素相对充裕和“后发效应”等比较优势。因此,战后东亚国家和地区就很自然地形成了世界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它的形成,为其出口创造了条件。市场的开放和出口的增长,使得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资本日益充裕,资本渐渐地成为具有一定优势的投入品,产品也逐步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化,而此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依然是世界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图 1 表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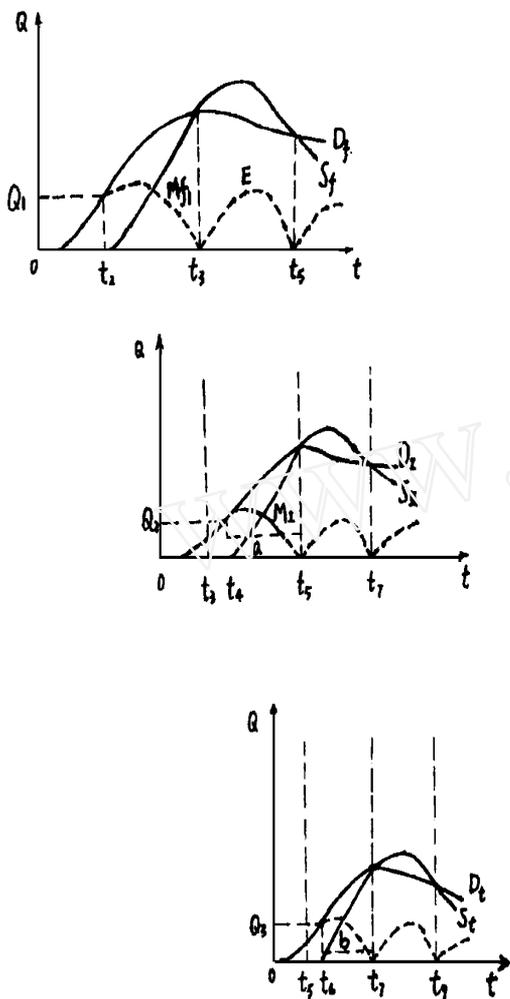


图1 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

图1用“雁行形态论”，说明从“进口代替”向“出口导向”的政策转移过程，同时表示“比较优势”的变化。

如上所述，东亚发展模式是在西方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而东亚国家尚没有具备以原材料、中间产品、资本和技术为主的工业化基础，并且缺乏为了引进这些工业化基础所需的外汇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经济演进过程。在国际经济迅速变化的情况下，亚洲各国首先要逐步形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比较优势（ $t_3 - t_5$ ）。从 Q_1 这一点，国内生产将开始代替最终产品进口（ Mf_1 ）。因为这点的进口规模就成为国内生产可能的最小生产规模，同时逐步奠定形成比较优势的基础，以使“进口代替”政策转向“出口导向”政策（ t_3 ）。同时也逐渐发生产业结构的变化，即资本密集型产业（ t_4 ）。因为劳动密集型国内生产继续增加，将使对资本品的进口一直到一定时期也增加，从而对资本品的国内生产逐渐代替进口的过程就开始。这时，政府将以采取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产业政策促进该产业的外向发展。随着劳动密集型的比较优势失去，使政策趋向侧重资本密集型的比较优势（ $t_5 - t_7$ ），最后推向技术密集型比较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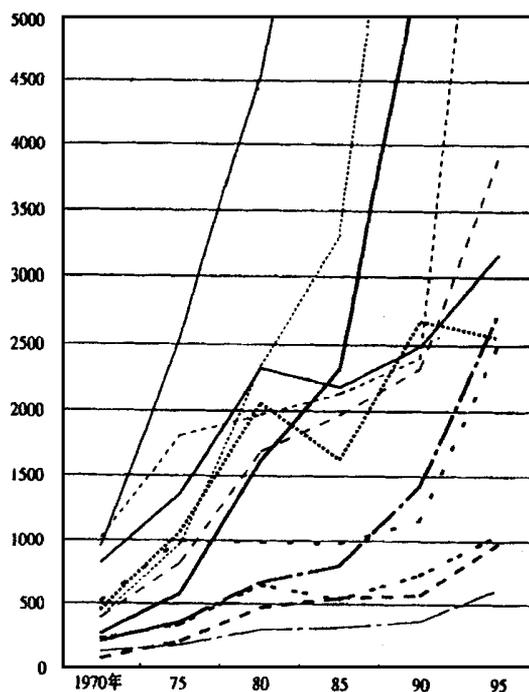
的发展。这一过程就意味着经济发展阶段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这里需要注意：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是资本密集型转到技术密集型，政府将为了保护国内“幼稚产业”所能采取的政策范围将面临着限制，保护时间也将缩短（ $a - b$ ）。因此对曾经享受过的“后发效应”也将付出代价。因为市场机制将逐步在国际经济关系上起关键性作用。

据图1，可以了解到，东亚各个国家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一定的国际环境下，在政府主导下和市场机制一定程度的运作下，从进口代替转向出口导向的政策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说明，这种模式为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同时也使它更需要适应国际经济发展要求。所以，东亚模式应该被理解为具有一个发展的阶段性的动态模式。

总之，东亚模式是建立在东亚经济、政治、文化及历史背景上，以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的作用演化、进口代替向出口导向转变、赶超目标为发展的本质特征，具有适应各国文化特色、同时具有动态性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

二、对亚洲经济模式的评价

80年代末90年初，整个西方经济一直处于低增长的状态，而除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继续保持7~8%左右的高增长率外，新兴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也出现了每年7~9%的经济高速增长，颇引人注目。



说明：— 韩国 ——— 台湾 ——— 新加坡 ——— 泰国 ——— 马来西亚 ——— 印尼 ——— 菲律宾 ——— 中国 ——— 巴西 ——— 秘鲁 ——— 阿根廷

资料来源：经济·ミナリ，1998（8），PP.55.

图2 东亚国家和地区及南美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推移

表 1 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成长的动向和展望 (%)

	人均 GDP 1996 (美元)	1970- 1996 年 (平均)	1997 年 (推定)	1998 年 (预测)	1999 年 (预测)
新加坡	25650	8.2	7.6	2.7	5.0
香港	25400	7.5	5.1	1.8	3.8
台湾	17720	8.3	6.3	5.0	5.7
韩国	12410	8.4	5.6	- 2.5	1.7
马来西亚	9703	7.4	7.4	1.6	1.8
泰国	8370	7.5	- 0.7	- 4.0	3.7
印尼	4280	6.8	5.4	- 5.2	2.9
中国	3120	9.1	8.9	6.3	7.5
菲律宾	3060	3.6	4.8	1.9	4.0
经济发达国家	22700	2.7	2.8	2.6	2.6

说明: 人均 GDP 以购买力评价 (PPP) 为基准。

资料来源: Tigers A drift, Economist, March 7- 13, 1998,

Table 3

他们都采取以外向出口产业为主导, 即产业政策与外向型发展的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经济政策, 产业的升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外贸易实现的。因此,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必然具有开放性特征。开放性程度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即从劳动密集型转到资本密集型, 再升到技术密集型, 可具有不同的特征。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之一是模式的演进性。据此,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劳动密集型转移到资本密集型的“近代化”阶段。第二阶段是从资本密集型上升到技术密集型的“现代化”阶段。

在近代化过程中, 东亚国家利用出口导向政策实现所谓“亚洲奇迹”的经济发展, 但出口导向政策却使东亚国家面对着世界经济秩序, 受到世界经济秩序的制约, 同时面临着经济一体化的浪潮。

东亚国家随着脱离殖民地化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的形成, 在官僚机构的强化和农村保留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下, 建立了以近代化为中心的自主国民经济目标。以通过政府的权威性推动优先资源配置外延性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 东亚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上具有地区的特殊性, 即国际自由资本移动的一定限制, 强有力的政府和脆弱的市场及脆弱的社会。因此, 东亚经济暴露出的最大弱点是: (一) 政府的过度干预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形成了投资的浪费和低效率, 以及官商勾结, 贪污腐败滋生。(二) 引进外资发展外贸及对外负债往往脱离本国的基础和实力, 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变化, 当本国经济适应不了时便会发生危机。(三) 产业结构不合理, 技术力量不足, 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总是处于低档次的劣势地位, 从而国际竞争力日渐削减。(四) 金融制度不完善, 法制体系不健全, 金融管理和监督不利等也是一大问题。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对各国“近代化”目标的实现曾起了关键性的

作用。因此, 只是由于这次在亚洲地区爆发的金融危机而采取否定东亚发展模式的态度是不正确的。发展过程往往会有有一定的曲折、波动、乃至危机。已经处于前沿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早就经历过类似的危机。以前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达 30 年没有发生重大的经济危机, 这本身可以说就是一个奇迹, 所以, 简单地用现在的危机来否定东亚发展模式是片面的。但另一方面, 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 东亚发展模式自身也需要有效制度的安排和政策选择, 即近代化的成功要求东亚经济模式进一步演进, 以使东亚经济模式适应国际经济、政治上的新变化, 从而转向“现代化”道路。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 虽然东亚经济模式已经开始了由近代化的东亚模式向现代化东亚模式的转变, 但转变的进展缓慢, 从而一方面造成了产业结构的落后, 另一方面也跟不上由出口导向所引起的世界化的近代化制度的安排。

因此, 在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 为了使东亚模式继续对东亚经济发展起有效作用, 它应随着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有所调整, 亚洲各国更要依照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制度安排和发展思路的调整。只要在制度安排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发展思路跟上现代潮流, 东亚发展模式还可以在相当时期继续发挥作用。当然, 这样一来, 东亚模式已与原有的模式有所不同了。

三、例举: 对韩国经济模式的剖析

自 60 年代以来, 韩国经济飞速发展, 由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 30 多年来以年平均 8.2% 的增长速度取得了所谓“汉江奇迹”的经济发展, 并创造了以财阀大集团为主的强力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体制。这一“开发独裁体制”, 既是韩国政府的成功之作, 也奠定了其今日体制的基础, 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 有些经济学者产生了对作为“东亚经济发展模式”之一员的韩国经济模式的怀疑态度。

韩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 以从属的国家垄断体制为主的陈旧的韩国社会发展模式。韩国发展模式具有以非效率的家庭经营和借款经营为主的财阀大集团、权威主义及国家主义的产业化模型及政企不分等特征, 即所谓“朴正熙模式”。这一模式, 在 1987 年韩国民主化运动和 90 年代的经济全球化的国内国外环境下, 面临着变革的要求。虽然韩国发展模式面临着这种挑战, 但模式的转换却一直推迟到现在, 从而导致了韩国发展模式的危机。

以下仅以韩国的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为例进行较为具体的分析。

1. 韩国是以财阀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依靠大企业集团, 同时重视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实施, 而不是简单地依靠市场。政府不仅可以控制资金, 而且可以直接任免银行的行长, 从官员中和有从政经历的人员中选任行长, 所以, 政府很容易影响信贷和资金流向。边缘的另一特点是政企之间的特殊关系。政府重点扶植财阀大企业, 利用对银行的影响给大企业以优惠贷款, 而大企业又对政府有很强的

依赖性，这就潜伏下爆发危机的内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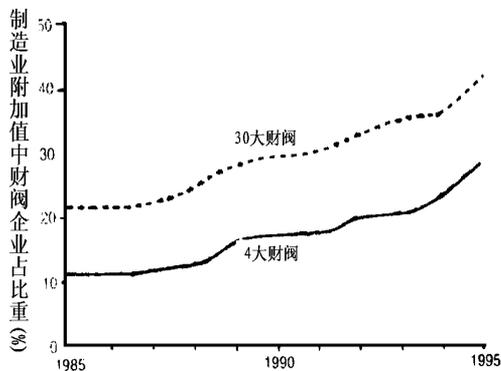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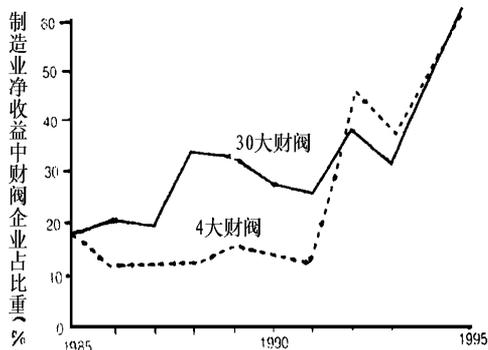


图3 在制造业的财阀大集团经济力集中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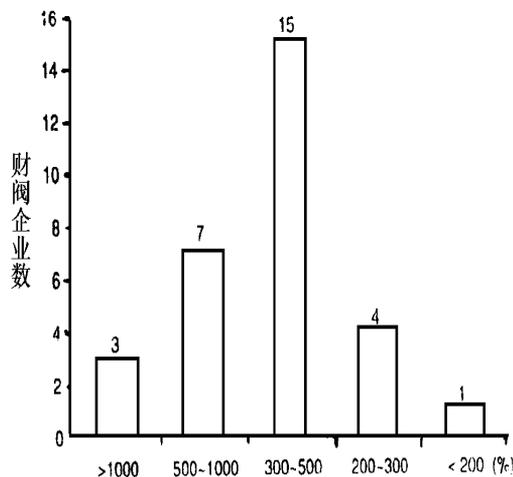


说明：4大财阀企业是现代、三星、LG、大宇。
资料来源：Boose alen&Ham ilton:《韩国报告书》，78页，
每日经济新闻社，1997。

图4 财阀大集团的经济力集中度：净收益

政企之间的这种结合，一方面支持了企业的目标扩张和重复投资。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规模、向外的扩张速度和扩张范围令人惊讶。有的企业集团的经营范围扩大到农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饭店及通信和银行等第三产业。韩国30家财阀大企业占制造业附加值的40%，比10年前增加20%。40%中的2/3是由4大财阀创造的。在净收益方面，30家大企业占制造业净收益的50%。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的资金被浪费，而给银行造成了大批坏帐，同样滋生出贪污贿赂的腐败风气。例如，1997年韩国11家主要银行的呆帐率达到14.3%，而不久前一些大企业纷纷破产，都与这一体制的特点有关。



资料来源：Boose alen&Ham ilton:《韩国报告书》，227页，
每日经济新闻社，1997。

图5 30家大财阀的负债比率

表2 四大集团的成长过程

	现代	三星	乐喜金星 (LG)	大宇
母企业	现代建设 (1947)	三星物产 (1951) 第一制糖 (1953) 第一毛纺 (1954)	乐喜 (1947) 乐喜商社 (1953) 金星社 (1959)	
60年代多元化企业	现代汽车 (1967)	金州造纸 (1965) 三星电子 (1969)	湖南炼油 (1967) 金星电线 (1962)	大宇 (1967)
70年代多元化企业	现代重工业 (1973) 现代综合商社 (1976) 现代商船 (1976) 现代精工 (1977) 仁用制铁 (1978)	三星电管 (1970) 三星电器 (1973) 三星重工业 (1974) 三星石油化学 (1974) 三星半导体通讯 (1977) 三星航空 (1977) 三星建设 (1979)	乐喜金星 (1971) 金星产电 (1974) 金星情报通讯 (1978) 金星半导体 (1979)	大宇机械 (1973) 永新土建 (1973) 东洋证券 (1973) 韩国投资 (1973) 大宇电子 (1974) 大宇重工业 (1976) 大宇造船 (1978) 大宇汽车 (1978)
80、90年代多元化企业	现代电子 (1983) 现代炼油 (1993)	三星汽车 (1995)	乐喜电子 (1989)	大宇精密 (1981) 大宇通讯 (1983) 大宇电子元件 (1983)

资料来源：高明华：《韩国企业的发展及结构调整》，打印稿。

2. 韩国企业的经营体制,是以家族经营为中心建造起来的。财阀系统所属的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高度集中。例如,90年代20多家大企业集团中,31%的高级主管由家族成员担任,29%的高级主管是通过系统内部关系网“选聘”的。集团内的管理缺乏科学性和民主性,往往由领导者个人确定企业的发展战略。集团内部互相担保,相互依存。内部结构调整困难,一旦一家出现险情,就会引起连锁反应。

3. 韩国企业的经营又是在政府以发展重工业为重点的发展战略下进行的。1995年韩国政府又实行了“全球化战略”,这就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过度投资的结果则引起了社会经济边际成本上升,GDP增长率下降(由1995年的8.9%降到1997年一季度的5.5%),30家最大企业中有17家因经营不善而陷入财务赤字。韩国政府对大企业的偏爱和干预,从长期看政府用优惠贷款支持条件恶化的企业的政策趋向,不仅引起了投资者对政府效率的怀疑,降低了政府自身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信任度,而且还恶化了开放环境,引起资金外流。同时韩国企业多数都负有外债,随着汇率的变动,短期外债变成了悬在企业头上的一把“利剑”。再加上在国际资本市场上韩国的信用下降,海外对韩国银行同业放款利率提高(由0.4%上升到3.8%),从而使引进外资很困难。一旦国外经济环境恶化,也就很容易引发国内危机。因此,韩国的体制模式和发展模式都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

注释

克鲁格曼(Krugman)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著名经济学家。他认为亚洲经济奇迹与其说是由于良好的计划和生产率提高,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充足的劳动和资本。即东亚的奇迹是象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

下的暂时性高度增长一样,只不过是靠生产要素投入的量的、外延性增长的奇迹。因此,如果不能在技能和教育方面更多投资,而且不能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亚洲的增长曲线必然下跌。

其代表例子有:Clive Hamilton(1983),Mann Landsberg(1978),Frederic Deyo ed(1987)。

尹翔硕:《东亚经济模式过时了吗?——从对外经济角度进行的分析》打印稿。

香港是例外,据“以发展为主导的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说法,在亚洲,主要存在以政府主导为主的日本模型和以自由市场为主的香港模型。所以,东亚发展模式具有在这两个模型之间的多样化特征。

史举:《历史地、发展地看待“东亚模式”》,载《亚太经济·亚太纵横》,1998(2)。

有对“雁行形态论”的异论。一方是:把日本看作领头雁,从而主张东亚模式指日本向亚洲国家产业转移过程中形成的模式。另一方是:否定“雁行形态论”;主张日本一直到80年代中期表露了脱离亚洲政策,80年代后期的日元升值才使日本的注意力转移到亚洲国家,这时,东亚国家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基础甚至处于现代化进行过程。如果说,当东亚国家形成发展模式时,日本起了“领头雁”作用,这只能说明“侵略时代”东亚各国的历史伤痕。本文不讨论这个问题,只用“雁行形态论”说明东亚各国的经济或产业政策的变化。

东亚各国刚从殖民统治解脱出来以后,各政府为巩固政权而需要获得民心,以形成“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因此,可以说,将经济过程融入政治过程是东亚模式特征之一。据新古典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和“开放贸易”与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政策指导存在着内在矛盾。但在东亚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却一直和平共存。

周立群 禹在基:《对韩国政企、政银关系的一点观察》,载《经济学信息报》,1998-07-18。

韩国的负债比率计算办法同中国有所不同,韩国为负债/净资产 $\times 100\%$,中国为负债/总资产 $\times 100\%$,如按照中国算法,现代、起亚和真露的负债率分别为81.36%,84.02%和95.89%。”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曾德国 陈永清)

(上接第64页)绝大多数人因资金短缺或影响了生产或转向高利贷者求助,无论哪种情况都对农民不利。因此,国家应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通过向农户提供合理的贷款,保证家庭承包经营的正常发展;(4)加强农村的水利、道路、电网等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治安工作,使农户的生活和生产,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促进农业生产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和改革,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营。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指出,“少数确实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和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展望我国农业生产家庭承包经营的发展前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是一个方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对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产品成本,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有两个途径,一是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农户购买和销售的流通过程统一起来,使参加其中的农户变成“生产车间”,实现规模经营;二是使土地流转到种田能手处,便于采用大型农业机械耕作,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当然,土地

权的合理流动,要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进行,不能以任何理由强制农户转让。

第五,加快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的步伐。积极促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在具有缩小城乡和工农差别、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减轻其对城市的压力、加快农村社会进步的步伐和农村的精神文明水平等重大意义的同时,对于农业生产家庭承包经营也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便于农产品集散,加快农户资金周转速度,提高农户的经济效益;二是在农村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农户承包的土地接近道路和城镇,可以提高农户的级差收益;三是在农村进行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能够带动和促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可以吸纳一定数量的农业劳动力和人口,进而加速农村的土地向种田能手处转移,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

通过为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条件,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进我国农业的不断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持续、健康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注释:

《邓小平文选》,第3卷,3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 北京 100081)

(责任编辑:金萍)